

文学地理学视域中 文学话语策动的西部机会

白 浩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文学地理学将空间维度引入文学研究,这将促使“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而在既往被价值评判边缘化的西部区域将获得重审的机遇。因为战争和革命环境的特殊性,西部其实于 20 世纪也曾有两次作为中国文学策动中心的机会。一次是延安,革命文化选择在此燎原,西部本土文化特有的正负能动力量、以及这种动能的有限、动能衰竭之原由均值得探究。另一次机会在重庆、昆明,但均未成为中心。

关键词:文学地理;话语策动;西部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6-0100-05

新时期以来,对于文学发展与文学史的观照视角发生了多元化的变动。20 世纪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开发出民间话语、启蒙话语等价值,新世纪“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文学地理学新视野则转变以往的时间神话思维为空间维度,这将为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契机,而以往在现代性价值体系中被边缘化的西部文化与文学也将因此获得重审的机会。

一

学界早已认识到,在建国以来社会文化高度统一在政治文化精神之下,文学从外在形态到内在动力的丰富性被抹煞和遮盖。形象地说,大一统、一种色彩的文学地图早已被规划好,文学体制化、一体化的过程就是将杂色的地图强行统一到一色中去。每一种推动文学、文化呈现出多样形态的背后都有其独特的内在运行精神体系,就这些各异的精神体系

而言,它们构成了精神主体独立性的“主权”地图。因此,在大一统文化系统中,难以容忍这样多色杂陈的“主权”地图。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重写文学史”运动正是对既往政治地图的一种反叛和扭转。在现在看来,它更侧重以对民间话语、知识分子话语的发掘来纠正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色性,这种史的重写更侧重于一种时间维度上的回顾和对抗性价值纠偏。这种重写的冲动乃因于主流意识形态压迫愈盛时也就危机愈盛、反动力愈盛,故而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成为一项轰轰烈烈又意味绵长的文化活动。在 90 年代和新世纪里,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有了很大改变,它一方面是主动以更为宽容和自由的姿态出面,另一方面也因为其精神动力的虚弱化而呈现出话语统治的空洞化趋势,因而文学形态走向多元化乃至失控化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也正因为这种文学事实的变化,面对政治大风车的坍塌和商业文化精神对知识分子主体性的消解,所谓“重写文学史”的政治性冲动也衰竭下来。

收稿日期:2011-1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当代西部文学发展的身份记忆与世界性研究”(编号:08XZW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白浩(1973—),男,四川旺苍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对抗性的政治原动力衰竭后,推动文学研究这个火箭继续爬升的动力源何处寻觅呢?在此背景下,在新世纪文学研究格局中,文学地理学以及新兴起的生态美学、生态批评可堪称接力的二级火箭。杨义、梅新林等先生提出的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研究引入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等新的跨学科视角,为文学研究路径别开生面。杨义曾简要地归纳其“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研究角度:“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问过我:现在做什么研究?我说,我在文学研究的时间维度上增加了一个空间维度。他非常感慨地说,现在欧美学人很多都想做这个事,都开始做这个事。”^{[1]7}在对抗性的以至充满情绪性驱动的“重写文学史”之后,“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主张力图进一步探究和还原文学现象背后更多样多层的文化动力,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也将为文学史研究赋予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更多的理性成分。与以往“文学地图”的比喻义不同,现在的文学地理学意味着将地理的空间维度视为文学史格局的重要标尺,由此将恢复地理学意义下“地图”的本来意义,这也意味着在既往“史”的时间维度上被价值评判边缘化的西部区域将在新的空间地域维度上获得重新审视和评价的新机遇。大一统的时代决定了大一统的文学,而现代化、多元化的时代催醒了潜在的身份意识寻找及其活力焕发的内在质素,空间意识与空间美学正是如此被推到新的认识领域里来。

作为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从理论倡议到具体实践的一大步,梅新林于2006年出版的80万言著作《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在更为宏大的古代文学史整体格局中落实文学地理学的建构。他梳理和归纳出中国古代文学地理表现形态和演变规律,即“以文学籍贯分布为始点,然后依次向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三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模型与规律的探讨”^{[2]1}。在黄河、长江、珠江、运河三横一纵流域轴线,首都陪都的双都城市轴心,向心、离心、交互型的文人流向,以及西北向东南的四次、东西向南北第五次的区系轮动的大格局中,梅新林归纳出“三秦区系犹如一台巨型‘发动机’,一次又一次地发起由西北向东南的区系轮动,而吴越区则如一个巨型的‘聚宝盆’,一次又一次地向三秦及其他区系吸纳文学资源,在流域轴线之‘动脉’、城市轴心之‘心脏’、文人流向之‘灵魂’三者的综合作用下,最终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学版图的独特景

观”^{[2]1016}。而在其看来,在西学东渐、中外文学对接交流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版图从西北向东南的区系轮动,既出于西北文学资源逐步消耗殆尽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未尝不是一种交融着朦胧与清醒,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主动选择”^{[2]1016-1017}。梅新林的研究为中国文学史地理演变格局的还原,为文学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这种还原中我们也为西部文学的曾经辉煌和策动全国、既而衰竭的变迁而震撼和深思。

正因为历史大潮中文学中心的东移,20世纪中国文学分别在北京、上海的双都城市轴心中展开西风东渐下之东系繁盛。在此潮流中,西部被边缘化,即便于国内仍然存在的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冲突、现代工商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的矛盾,也主要转移到东部并以海派与京派的分立而呈现出来。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上海作为经济、文化中心,辅之以江浙作家群体,构成现代文学的主体带,即便是籍贯为西部、中部的作家如郭沫若、巴金、沈从文等,其主要游历或生活的场所也是在这两个中心点周围。在既往的“现代性”学术主流话语体系中,西部文学成为被近乎忽略的弱势空间,然而于今回顾,因为战争和革命环境的特殊性,西部其实于20世纪也曾有两次作为中国文学策动中心的机会。

二

作为全国文学话语策动的西部机会,一次是陕北延安。作为红军长征的终点,延安成为共产党政权的中心,并作为革命圣地的象征,成为全国进步人士和青年们景仰和迁徙的目的地,既而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策动兴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及文艺运动。从政策指向上来说,《讲话》奠定了建国后17年到“文革”的当代文学基本格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等内在精神规定,也成为当代文艺的基本信条。延安精神既是马列主义革命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西部本土精神在新时代的发掘和焕发,而作为其灵魂的毛泽东思想正是马列主义的中国本土化产物。斯时也,斯地也,而成就此等功业,其无因乎?前已有学者如赵学勇等注意到这种“文学中心的西移”现象,并提出:“让人感兴趣的是,曾经不为文学垂青的西部,是如何在突然

之间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的中心?”^[3]但论者主要仍在五四文学到革命文学、左联文学的宏观时代背景中探究各自的精神特质与变迁,而终究对此现象后的西部缘由及区域性文化元素的探究尚不明确。

回顾历史,延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并推动其走向最终胜利的历程,在偶然中并不乏其必然性因素。其一,陕西历来便是王朝兴发之地,其地利之易守难攻,民风民性之坚韧倔强,吃苦耐劳,战斗力强,这些优势,古今贯之。其二,自宋以后,因为经济的落后以及自然环境的恶化,陕北生活环境恶劣,这固为不利,但同时也锻炼了民众吃苦耐劳、朴素简单的生活方式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使其具有极强的苦难承受能力,同时也激发出民众反抗的积极性与彻底性。其三,正因为其文化的封闭与落后,故而民性淳朴,易受精神的引导与控制,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具有先天亲和性和奉献牺牲的精神基础。有以上诸利,而艰苦朴素则是革命者所必须接受的客观条件和所必须付出的精神联结纽带,故可以说革命者与陕北土壤的精神气质一拍即合。正因以上之原由,马列主义这样的洋思想与西部的本土文化相结合,熔铸为简单但顽强执着的延安精神而成为解放区的文化精神之魂,并进而成为建国后的国家精神。这种结合,在那首经典的陕北民歌《东方红》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朴素而又深沉的民间文化、质朴而又强悍的民众,与先进的革命思想和英明领袖崇拜,形成灵魂与血肉的全面结合,“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的高亢腔调唱遍全国,进而成为新的国家文化精神的象征。正是依靠这样的人民,毛泽东与共产党寻找到中国革命本土化的力量之源,也正是以这样的区域文化精神为后盾,以《讲话》为代表的文艺民族化、大众化方向才能撼五四文学以来的个人主义、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等洋化文艺道路,在文艺的高雅殿堂里也被“泥腿子”给革了命,改造了。正是有了这些如贾平凹所谓之为“二楞”的秦地秦人、秦腔秦魂式的西部本土化、民族化原始伟力与文化为支撑,才可能实现对五四文化与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的相抗相抵,并终而压倒性获胜。

在经历“文革”劫难后,80年代的伤痕、反思性控诉及“重回五四”的思想再次反拨已经构成了新的思想传统,而延安及17年文艺路线这样的老传统则

多被赋予“污名化”的负资产性质。但客观思之,无论于20世纪,还是近三百年来近现代史,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解放的正是这一聚讼纷纭的本土化路线的革命文化。面对已经取得了文化领域现代性革命伟大胜利的五四神话,面对具有话语统治权的西(洋)化话语,延安的革命实在堪称伟人思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中国的胜利,这个胜利正是在西部背景、民族化本土化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从西洋化到西部化,其间的文化元素、精神方向、实现路径、依托力量,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其伟大意义及深刻内涵的思考和挖掘时至今日看来仍未及深入。这个文化与文学的革命挑战了五四巅峰,改变了中国人精神的路径,改变了文化与文学的方向,尽管其后政治意识形态对此的过多裹挟而导致走向“文革”文艺的末路,甚至在新时期重续五四之脉的文化语境中不断被污名化,但新时期以来文化与文学精神的过度西化危机也在新世纪引起学界对“纯文学”等的检讨,而对“底层文学”、“人民性”文学的关注和讨论也产生出对另一个传统重新思考以及正名和扬弃的新的可能性。

对于这个策动于西部本土的文化革命的效应思考应该是多重性的,包括其负面性。以往对建国后文学一体化乃至“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已经多矣,但这种探讨也一直并未引入西部文化视角。其实,即便是建国后文化精神的负面发展,也可以从延安西部背景中找到些根由的解释,如农业文化的固执、狭隘,农民生活方式对于知识分子、都市文化的排异与仇视等等。延安精神以对五四以来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自由、民主、博爱等西化思想的批判和颠覆而宣告本土文化精神的胜利,对洋化和殖民化的生活方式也实现了根本的农业文化生活方式的回归。因而,这场革命的胜利一方面是最先进的西方思想的胜利,但另一方面又是最传统的中国本土文化和本土人民的胜利,这种奇特的结合在“文革”中的失控就会产生出在最革命口号下的封建专制文化的复辟。

不光是文化精神,在人的构成成分上,延安文学到建国后的文学队伍也实现了根本性的整体更迭和换代。洪子诚先生在他那部影响当代文学史格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便统计到五四一代文人与建国后文人的身份区别,洪先生称之为“‘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之别”：“首先,从作家出生的地域,以及生活

经验、作品取材等的区别而言,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的转移。……‘地理’上的这一转移,与文学方向的选择有关。它表现了文学观念的从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意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的表现的变化”^{[4]30-31}。洪先生谨言慎行、力求中正允和地评价其好处说:“这会提供关注现代文学中被忽略的领域,创造新的审美情调的可能性,提供不仅从城市、乡镇,而且从黄河流域的乡村,从农民的生活、心理、欲望来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的视域。”^{[4]31}其次,与之相关的是对待文学的功利性态度,“中心作家”服膺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信条,洪先生再次中正地分析说:“明确的目标感和乐观精神,必然是他们作品的基调。”^{[4]31}再次,是文化素养的变化,从五四一代作家的留学与学贯中西不同,“中心作家”则大多学历不高,主要是依靠在农村、战争和革命运动中的生活经验而写作,因而“一本书作家”成为普遍现象^{[4]31-32}。

在提请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文艺发展注意其西部元素发掘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其有限性。事实上,即便延安成为革命圣地,但这与文学圣地却仍是两回事。一方面,缺少文化修养与文学积淀的本地忠诚革命战士并不能摇身一变而为文学之材,搞创作的主体还是那些迁徙而来的文人群体,如“鲁艺”(鲁迅艺术学院,以周扬、陈荒煤、黄钢、陈涌等为主)与“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以丁玲、艾青、舒群、刘白羽为主)的两大团体,正是以他们为主体支撑着延安文艺界,也是依靠他们创作出解放区经典文本《白毛女》。而即便作为本土旗帜的赵树理,也是山西人,在其影响下兴起的山药蛋派均算是中原地界了。另一方面,在延安,文人们过得也并不算愉快,“整风”运动使其创作自由及文人习气大受挫折,丁玲、艾青等的检讨,王实味的毙命,都成为文坛陈年公案而被人不断提起。因而,延安对文学格局的影响主要是精神气质上的,而非队伍规模的。

尽管延安确实成为革命文化的策动中心,但毕竟文明发展的大势难以逆转,因而,随着新政权的建立,革命领导中心也迅速东迁到了北京,而对于新中国政策的功过评价也都归之于北京,并没有人将其过多地从现实功利评价与文化精神上追究探源到延安与西部文化的身上。如梅新林所说,这次从延安

到北京的迁徙可谓是西北发动机再次动能衰竭。事实上,放到再宽一点的时间范围看,这个革命的起点也并非西部之延安,而是始于上海之中国共产党成立,历三大起义,到江西井冈山、瑞金,再到二万五千里之迢迢征程,火种才到达了延安,之后又回到了东部。延安的策动,一方面是见龙在田式的不得已,作为万里长征的终点而成为革命迁徙途中的一块歇脚地和一块跳板;另一方面,从时空影响广度和性质看,其策动也终究是短暂和有限的,用革命的习用语来说也就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在现今政治话语控制已经相对中性的时代里,回顾历史,在文学地理学视野中,西部曾有的一次中心机会需要我们去再度凝视,革命文化选择在此燎原,固有“时也命也”的偶然性,但西部本土文化特有的正负能动力量,以及这种动能的有限、动能的衰竭之原由均值得再加探究。

西部的另一次机会同样是战争环境强行赋予的,即抗日战争中民国政府迁都重庆形成的政治中心和大学内迁形成的西南联大文化中心机会。鉴于蒋介石政权的不得人心和陪都重庆的时间短暂,重庆所起的文化影响力有限,要言中心显然是力不能及的。这情形正如郭沫若曾嘲讽转述的“在重庆时蒋宋美龄曾与谢冰心作过一番谈话”那样:“蒋宋美龄问‘中国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谢冰心回问‘中国国民党又有那一位男作家’?这是在文艺圈子里面传播得很广的一段插话。”^{[5]291}而昆明的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和腐败遍地的环境里,独举思想自由独立旗帜于一隅,真可视之为一个奇迹,有为学之大师孜孜以求,有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现代主义诗风之独立,有学者论政之独立,昆明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一块精神圣地,在其后的历史长河中仍时时有人追怀其精神源流。然而,毕竟它只是战争环境中的一个特例,知识分子们走出校门便连人身安全也难保了,何况同重庆一样,其来也匆匆,其去也匆匆,抗战结束便各自纷飞作鸟兽散了。而且,与延安迥异的是,重庆的政客、昆明的知识分子均是作为一个外来团体而自成系统独立运行,并未与本土民众及文化有机结合,故而缺少土壤,自然也不能燎原。因此,西南之重庆、昆明均难算作中心,所谓“西部的机会”不过是战争强作的拉郎配机会罢了。如果说延安的成功正在于其革命文化的本土化策略,那么,重庆与昆明的昙花一现其因也正在于其对比

鲜明地对本土化的不屑一顾及其必然的水土不服,重庆与昆明正成为一个逻辑上的反例而印证着延安成功的缘由。回顾这两次对比鲜明的 20 世纪文学话语策动的西部机会,探究中国化的本土力量之源,

既是对既往历史地图的重新认识,也是对于当下及未来中国文学发展路径选择及精神元素的思考 and 探究。

参考文献:

- [1]杨义.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M]. 北京:中国当代出版社,2007.
- [2]梅新林. 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 [3]赵学勇,孟绍勇.“文学中心”的转移与当代文学“新方向”的确立[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 [4]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5]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16 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The Opportunity of Western Regions in Literary Discourse Instigation From the Literary Geography

BAI H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Spatial dimension, introduced by literary geography into literature research, will prompt the map-making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offer an opportunity to the marginalized western regions' redefinition. Due to the special environment of war and environment, western regions actually has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the cent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One was in Yan'an where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started.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ctive power of the western local culture, the limitation of that power and the cause of its exhaustion. The other was in Chongqing and Kunming. Neither two became the real center.

Key words: literary geography; discourse instigation; western regions

[责任编辑:唐 普]